書評: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述評

周延燕



書 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編 者: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

出版地:上海市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1989.10 — 1990.12

册 數:9冊

高 廣: 20×14公分

價格:第1冊,人民幣43.6元

第9冊,人民幣48.8元

ISBN: 7-5325-0068-3 (精裝)

7-5325-0868-4 (精裝)

語 文:中文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一書之編輯,從籌備到全書全部出版完成,歷時二十年,共收錄中國大陸古籍善本約六萬種,收藏單位近八百家,為中國大陸近數十年來所編輯規模最大的現藏古籍善本聯合目錄,其價值及影響廣為學術界所稱

關鍵詞(Keywords):書評;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顧廷龍;善本書;書目

Book Review; Catalogue of Rare Chinese Books; Gu Ting-long; Rare

Books; Catalogue

周延燕: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班; E-mail: cps@ntu.edu.tw。

道。本文擬就此書編輯緣起、編輯過程與參與人員、編輯體例,以及此書的功能 價值,此書的優、缺點等方面加以探討,以期能夠對此書有比較深入的瞭解。

→ 編輯緣起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的緣起,和周恩來有很密切的關係。根據冀淑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後記》中云: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是一部當今國家現藏古籍善本書的總目錄,本書的編纂出版,實現了周恩來總理生前的一項遺願。一九七五年,周總理在病中發出了「要盡快地把全國善本書總目錄編出來」的指示;這項工作,從一九七八年三月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在南京召開會議到一九九五年三月《書目》全部完稿,由於得到各級黨政領導的重視和支持,參與單位的大力協作,工作同志的積極努力,在編委會的領導下,全部完成。[1]

1975年為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末期,四人幫勢力崩潰的前一年。[2] 中國大陸在面臨十年浩劫,文物被嚴重破壞之際,由於周恩來的指示,加上文革結束,在政治環境上取得了有利的條件,使得善本古籍的調查及編目工作,能在官方的推行下順利完成,實為一件幸運之事。[3]

編輯過程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輯過程,大致可分為籌備與編纂兩個階段,簡述如下:[4]

(一)籌備階段

1975年,大陸國務院有關負責人員向國家文物局以及北京圖書館負責人傳達 了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其後,1977年1月,文物局在北京召開善本書目籌備會,聽 取北京地區部分人士的意見。同年4月,文物局又在北京召集北京圖書館、上海圖

^[1] 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叢部》(上海:上海古籍,1990.12), 後記 頁1。

^{[2]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捕,文化大革命由此落幕。有關文化大革命的始末,參考嚴家其、高皋合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臺北:遠流,1992.2)。

^[3] 有關《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與當時時代背景的關係,以及參與編輯的知識份子在歷經文化大革命以後所抱持的心態等,應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地方,因為篇幅關係,茲不細論。

^[4] 以下所述內容大體參考冀淑英所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後記》以及杜澤遜所撰,顧廷龍先生生平學術述略載於:《書目季刊》32:3,(1998.12)。

書館人員座談,討論有關書目的著錄條例、分類法,以及收書範圍等問題。同年 6 月,文物局再次召開座談會,對擬採用的分類法作出決定。[5]

1978年3月,國家文物局在南京召開會議,由全國各省、市圖書館、博物館、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等一百二十多人參加。會中討論了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方案和工作步驟。會後即開始展開對全國各地收藏的古籍進行普查。此次會議並決定成立由國家文物局所領導的「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工作領導小組」。

(二)編纂階段

在籌備階段完成之後,即進行實際之工作階段。在編纂階段中,又可分為準備、彙編與定稿三個時期:

1.準備工作時期

對全國各地進行善本古籍普查工作,約略以兩年的時間完成。各省、市、縣圖書館及其他藏書單位先進行古籍善本的整理編目,並查核校對原有的編目卡片,準備於1980年將卡片集中。在這期間,曾召開多次會議。 1978年的成都會議,著重討論古籍善本書目的分類法,並對著錄條例再加討論、補充。 1979年3月的廣州會議,重點在探討版本問題。 1979年8月下旬至9月,工作小組人員分組赴華北、東北、西北、華東、中南、西南六大區的省市圖書館和重點藏書單位,巡迴瞭解編目工作進行的情況,並協助解答工作上的各種問題。同年年底,南昌會議決定組成「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以劉季平為主任委員,顧廷龍為主編,冀淑英、潘天禎為副主編。

2.資料匯編時期

1980年,全國各藏書單位將目錄卡片報送至北京。5月,參加匯編工作人員集中北京,租賃香廠路國務院第六招待所作為編纂處,開始工作。匯編工作人員來自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圖書館、科學院、藏書較多的大專院校圖書館,共 40人。集中目錄卡片共138,471種,報送卡片的單位共有781個。

^[5] 冀淑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後記》云:「(一九七七年)六月文物局再次召開座談會,討論了分類法等事項,後由文物局王冶秋局長作出決定,書目分類用四庫分類法,可酌加修訂。」見註1,頁1。另杜澤遜,顧廷龍先生生平學術述略云:「分類體系,先生主張用四庫分類法,而當時有名牌大學正辦班批判四庫分類法,一些圖書館亦正研究新分類法,先生感到為難,就問文物局長王冶秋,王說:『新分類法我們等不及,就用四庫法』,事情就這樣定了。先生後來回憶這些事,對當時有關方面領導王冶秋、劉季平都十分感激。」見註4,《書目季刊》32:3,頁10。

各單位所報送的目錄卡片,經過匯編後,進行復審工作。 [6] 通過一系列工作, 各類卡片經審校後,陸續編成書本式「徵求意見稿」,先行油印分送有關專家、學 者及各圖書館,再由省、市圖書館分發至地區重點圖書館,廣泛徵求意見。

3.書目定稿時期

定稿工作於1983年8月由主編、副主編、顧問和工作人員共8人集中在上海開始進行。從經部開始,以油印本「徵求意見稿」為基礎,參考全國各藏書單位和專家們寄回的意見。逐條逐目加以審定。審定過程中若遇到疑問,乃利用信函調徵求書影以為比對,也曾組織人員至藏書地點查對原書。

經過兩年辛勤的工作,經部定稿於1985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後 叢部在北京定稿,1989年12月出版。史部在上海定稿,1991年5月出版。子部在南 京定稿,1994年12月出版。集部在北京定稿,1996年12月出版。至此全書終於告 成。計自1977年1月文物局在北京召開籌備會,至1996年12月全書全部出版,前後 共歷時20年。

三、 編輯人員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輯,動用了中國大陸全國各省、市、圖書館、博物館、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等近八百個單位的圖書館相關人員參與初步編目與卡片查核工作,其後參與卡片匯編的圖書館人員也有40人。這些都可顯示編纂此書實動用了十分龐大的人力。在整個編纂工作進行中,最關鍵的人員則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的編輯委員。在1979年年底於南昌舉行的會議中,即決定組成初步的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以劉季平任主任委員,顧廷龍為《書目》主編,冀淑英、潘天禎為副主編。[7]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主編顧廷龍對於此書的編纂,奉獻了極大的心力,杜澤遜在 顧廷龍先生生平學術述略 一文中,對顧廷龍的生平及其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關係已有敘說 [8],茲不再贅述。另外,沈津在《顧廷龍年譜》一書中,對顧廷龍一生的行誼及參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的過程,有極為詳細的記

^[6] 據冀淑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後記》云:「經、史二部由顧廷龍在上海復審,子部由潘天禎在南京復審,集部、叢部由冀淑英在北京復審。」見註1,頁3。

^[7] 同註1, 頁2。

^[8] 同註4。

載,例如《年譜》「一九八八年,八十五歲」中云:

五月,先生有致李一氓信,報告有關《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事。云:「關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工作,仰荷關懷,至為感激!該項工作原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開展起來,忽忽已逾十年,經同志們的努力,從分部說,經部已經出版,叢部在排版中,史部已發稿,現在手中有子部與集部,分在北京、南京定稿之中。最後還有一個綜合索引。所以從表面看,已完成了一半,實際上工作量尚不小。自主任委員劉季平同志逝世之後,其他副主任委員六人中也有去世者,現已成群龍無首之狀。定稿北京三人、南京四人,力量較為單薄,已發之稿亦非一二年中可以見書,必須有堅強之組織領導。建議請北京圖書館常務副館長杜克同志擔任主任委員,他對此項工作開始及經過均甚瞭解。請原副主編冀淑英同志擔任主編,她是著名的中國版本目錄的專家。龍已八十有五,衰老日甚,不克肩荷重任,請辭去副主任委員和主編,改任顧問。希望我公向文化部領導代達鄙忱,這樣可使工作重振旗鼓,早日完成周總理的遺願,實所感盼。」(先生筆記複印件)

六月一日,王蒙致李一氓信,「顧廷龍先生提出更換主任委員和主編的建議,我們考慮:為客觀如實地反映有關人士在書目編輯工作中付出的辛勤勞動,也為保持書目編輯體例等方面的一致,還是不改動為好。顧先生身體、精力尚好,還能領導定稿工作。為加強今後的組織工作,擬增補杜克同志任副主任委員,主持這項工作。」(原信複印件)^[9]

由此可知顧廷龍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中途,曾請辭主編職,然並未獲准,仍繼續黽勉從事。又如同書「一九九五年,九十二歲」中云:

四月上旬,先生在北京參加《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工作表彰大會,并作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工作總結」的講話,先生指出《書目》的編纂工作從準備工作開始,經普查、匯編、審校、定稿等幾個階段,歷時計十八年。前後參加此項工作的人員計數千人,參加單位近千個。該目收錄了我國現存於大陸的明朝及明朝以前的絕大部分和清朝的有價值的大部分古籍善本書,近八百個收藏單位,約六萬條款目。開創了中國古籍全國性書目的先河,并在編纂體例等方面既繼承了中國圖書目錄學、版本學的優良傳統,又有所

^[9] 沈津撰,《顧廷龍年譜》(上海:上海古籍,2004.12,1版),頁690。

發展和創新。尤其是在確定是否善本問題上,製定了以古籍的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藝術代表性為考察標準,具有較強的科學性、實踐性和可操作性。《書目》也體現了中國當代古籍目錄學、版本學研究的水平,它在古籍整理和研究理論上的建樹與影響也是非常重要和深遠的。(《文集》P.659)[10]

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完成之際,顧廷龍對這項艱巨工作的過程作了一個總結,並指出了此書的性質、價值和影響。

四、 編輯體例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分類,大抵依經、史、子、集四部分類而又另增「叢書部」,各部類目則酌量增刪修訂。因此,在20世紀的後半時期,在編輯一部公家所修的全國古籍善本書目之際,雖基本延襲清代四庫的分類,仍能反應出新時代的面貌和分類理念。[11] 有關《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輯體例,在此書編例中已有具體條列,可清楚瞭解。茲引錄其前六條如下:

- 一、本編所錄,包括全國各省、市、縣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文管會、文獻館、高等院校、中國科學院及所屬各研究所,其他科研單位等所藏古籍 善本。
- 二、本編分類,大體依四庫分類排比,各部類目酌予增刪修訂。彙刻群書, 歸入叢書部,列於四部之後。經、史、子、集四部中,同一部類之書彙 編為叢書者,俱入所屬部類。
- 三、各書之著錄,先書名、次卷數、次編著注釋者、次版本、次批校題跋 者。
- 四、各書書名,悉依原書卷端所題著錄,原書多卷而各卷題名不一時,以首卷卷端題名為準。
- 五、凡殘缺不全之書,書名下仍著原書卷數,現存卷數詳著於次行。原書卷 數無可考時,書名下著卷。不分卷者,著錄所存篇目,篇目不明 者,著錄存若干冊。
- 六、地方志於書名上冠以纂修時代,加方括弧標明。如方志原書名上已冠有

^[10] 同註9, 頁760-761。

^[11] 例如於經、史、子、集四部之外,又增列了叢部。另參考下文討論。

周延燕/書評:《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述評

時代年號者,按原書名著錄,不加括弧。[12]

以上六條為編輯體例中較重要的部分,茲舉 經部.詩類 中《毛詩註疏二十卷》一種為例,此書《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如下:

毛詩註疏二十卷 與第五箋 用其曆十七年北京國子監刻十三經註疏本 清宋綿初批校 羅振常跋 [13]

此書之著錄中,包含書名、卷數、注釋者、版本、校者及跋者等項目,其下 則附有此書之編號。

有關每書編號之作用及體例,編例第十七條云:

十七、本編各卷條目下均有編號,卷後附有藏書單位代號表和藏書單位檢索表,藏書單位檢索表首欄為書名編號,次欄為該書收藏單位代號,讀者須知某書在某單位,一索可得。[14]

這是為方便查考此書的館藏地點所設,透過《書目》卷末所附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藏書單位代號表 及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藏書單位檢索表 ,可以很清楚檢索到每書館藏的單位。

以上約略介紹《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輯體例,至於其體例的優劣檢討, 請參閱下文第六節。

五、 功能價值

在中國大陸歷經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國文化被嚴重摧殘之際,能著手編輯一部全國性的善本古籍聯合目錄,實在具有極深的時代意義。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前言》中曾云: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輯,是對全國各圖書館所藏古籍善本的全面普查與總檢閱,它不僅清理和保護了我國燦爛的古代文化,而且對於利用古代文獻開展各項研究工作,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具有深遠的意義。[15] 此說除了末句「社會主義」略有可商之外,大抵能說明《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12] 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上海:上海古籍,1989.12,1版),卷首頁3。

^[13] 同註12,卷2,頁2。原書為直行排列。

^[14] 同註12, 頁4。

^[15] 同註12.頁1。

編輯的時代意義。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實際功能,約可分為以下幾點略加敘述:

(一) 反映中國大陸現存善本古籍館藏狀況,有助於對中國古代文獻存佚的瞭解《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針對全國各圖書館所藏古籍善本加以普查與著錄,由此書可反映出中國大陸現存古籍善本的收藏狀況。書目的功用之一即在「考典籍之存佚」[16],透過《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比對歷代書目,可以考知中國大陸古代文獻在現代的存佚情形。

(二) 可據以檢索善本古籍的館藏地點,增進學術研究的便利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附有「藏書單位代號表」及「藏書單位檢索表」等,清楚記載了藏書的單位,因此當研究者需查考書目中所列的古籍時,能很清楚瞭解館藏的地點,提供研究的便利。

(三) 提供各種善本古籍的版本資料,便利各館藏版本的比對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完成之後,當各圖書館想考校館藏善本古籍或編輯善本書目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即成為重要的參考工具書。一方面可參考其體例,另一方面,《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所載的各種版本,可作為比對的基礎。從近年來編著完成的《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及《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二書中,即可看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這項功能。[17]

除了上述的三項功能之外,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的過程中,訓練出不少日後成為版本、目錄學的優秀專家。[18] 另外,在全國各圖書館參與此項工作的人員,能得到基礎的學習與訓練的機會,對提高圖書館人員的素質也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16] 同註12,頁1。

^[17] 例如《浙江圖書古籍善本書目》 編例 (杭州:浙江教育,2002.11,1版)第1頁,第五條云:「本目采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分類法,按類編排。」第六條云:「本目采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規則。」,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對此書的影響。另沈津所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中每每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作為比對,說明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各書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是否曾被著錄,此也可看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作為比對基礎的功能。

^[18] 例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中所列工作人員中有丁瑜、任光亮、李致忠、谷輝之、 沈津、沈燮元、陽海清、韓錫鐸等人,日後都成為極優秀的版本、目錄學專家。

六、 優缺點

本節擬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優缺點略作評論。

(一)《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優點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成之後,得到了極高的評價。主編顧廷龍在工作總結時自述此書「開創了中國古籍全國性書目的先河,並在編纂體例等方面既繼承了中國大陸圖書目錄學、版本學的優良傳統,又有新的發展和創新。」[19] 其說很準確地道出此書的優點。此外,程千帆、徐有富所著《校讎廣義.目錄編》中評此書云:

顯然,《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是建國後編輯的規模最大的古籍聯合目錄。它 既是一部大型的工具書,又是一部學術性著作。它反映了我國版本鑒定、著 錄、分類及編輯出版的最新水平。[20]

程千帆、徐有富二氏指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不但是一部大型的工具書,同時也兼具學術性,於此點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是在編輯者深厚、札實的學術基礎中所編輯出來的書目,故其可靠性值得信賴,加強了使用者的信心。

此外杜澤遜在 顧廷龍先生生平學術述略 一文中,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描述云: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從籌備到出齊歷時二十年之久,取得巨大的成功。全目著錄我國大陸現存明朝及明朝以前的絕大部分和清朝價值較高的古籍善本約6萬種,收藏單位近800家。分經、史、子、集、叢五部。(中略)鑒別精審,編排嚴謹,為學術界利用古籍提供了極大便利。[21]

杜氏此文指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不僅搜羅豐富,而且「鑒別精審,編排 嚴謹」,就大體而言,杜氏所評應非溢美之辭。

(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缺點

面對全國為數眾多的古籍善本,欲編成一部完整、可靠的書目,確實艱難。 尤其除編輯委員會的成員外,仍需基層圖書館員的配合,因而更增加其困難度。 在沈津所撰《顧廷龍年譜》「一九八二年,七十九歲」中載云:

^[19] 同註9, 頁760。

^[20] 程千帆、徐有富合著,《校讎廣義.目錄編》(濟南:齊魯書社,1998.4月,2版),頁325。

^[21] 同註4,頁11。

十一月初,先生去雲南省圖書館看書,潘樹廣陪同前往。潘詢及先生有關《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進展情況,先生表示:進展慢,困難多。由於經辦人不熟悉業務,各館上報的卡片存在問題較多。編委會向有關單位調閱資料,往往遲遲沒有回音,缺乏大協作的精神。[22]

從這裡顯示此書編輯所遇到的困難之一端。

由於此書的編輯存有許多實際上的困難,因此檢視此書,在諸多優點之外, 仍難免有部分缺點,例如傅璇琮在《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序》中談到: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把善本範圍概括為「凡具有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藝術代表性而又流傳較少的古籍」。這比起傳統的某些說法,確有新見。但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這一界定,學術界也有不同意見,有認為這樣的表述不夠明性,三性又加「而又」,則善本是三性兼備還是具備一性或兩性即合格,而且三性的概念也較抽象,難於操作。(中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在編纂時,是要求各藏書單位填寫版本形式即行款格式的,如每頁幾行,每行幾字,以及例如黑口左右雙邊等等。但後來正式出版時,行格版式的項目都被刪去,不少人對此頗有意見,有的曾舉例,如《爾雅》一書,一連九種都注明「明刻本」;《春秋經傳集解》,則有14種明刻本,讀者辨不清這些明刻本究竟有什麼不同。(中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可能數量龐大,由於工作原因,至今還未見有索引印出,給使用者帶來極大不便。[23]

傅氏論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缺點,主要是為了和《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作比較,以說明後者已經改進了這些缺點。傅氏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存在有「善本定義不夠明確」、「未著錄行款格式」、「未附書名和作者索引」等三項缺點,所評實為中肯。

此外,《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因搜錄的書籍極多,有些書編輯小組未能目驗,故著錄不免有錯誤的情形,例如沈津所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明刻本養生集覽五種》條云:

此書甚罕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南京圖書館有《修真秘要》一卷《保生心鑑》一卷《養生導引法》一卷,題明正德八年王蔡刻本,不確。[24]

^[22] 同註9, 頁641。

^{[23] 《}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序 (杭州:浙江教育,2002.11,1版),頁2-4。

周延燕/書評:《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述評

這 沈津指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對《明刻本養生集覽五種》著錄的錯誤。另周洪才著有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曲阜顏氏著述辨誤 一文 [25],也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曲阜顏氏著作的錯誤提出討論。

綜觀以上有關《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優缺點的檢討,可以瞭解此書雖亦存在部分缺點,然瑕不掩瑜,仍是一部價值極高,兼具工具性與學術性的著作。

參考文獻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叢部)(上海:上海古籍,1989、1990年)。

杜澤遜。 顧廷龍先生生平學術述略 , 《書目季刊》32:3(1998.12)。

沈津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上海:上海辭書,1999)。

沈津著。《顧廷龍年譜》(上海:上海古籍,2004)。

周洪才。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曲阜顏氏著述辨誤 , 《圖書館雜誌》159(2004.7)。

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編。《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杭州:浙江教育,2002)。

程千帆、徐有富合著。《校讎廣義.目錄編》(濟南:齊魯書社,1998)。

劉兆祐著。《中國目錄學》(臺北:五南,2002)。

嚴家其、高皋合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臺北:遠流,1992)。

^[24] 沈津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上海:上海辭書,1999.2,1版), 頁338。

^[25] 載於:《圖書館雜誌》159, (2004.7)。

Book Review: A Critique of the Catalogue of Rare Chinese Books

Yen-yen Chou

Abstract

The *Catalogue of Rare Chinese Books* lists approximately 60,000 rare editions of Chinese books to be found in roughly 800 collections in Mainland China. As the largest work of its kind to be published in Mainland China for a number of decades, this catalogue is of great value and benefit to scholars and researchers. This review will aim to provide readers with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is work by giving an overview of the following: 1. why this work being undertaken; 2. how this work being put together; 3. scholars taking part in the compilation of this work; 4. the format of this work; 5. uses of this work; 6.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is work.

Keywords (關鍵詞): Book Review; Catalogue of Rare Chinese Books; Gu Ting-long; Rare

Books; Catalogue

書評;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顧廷龍;善本書;書目

Yen-yen Chou: M.A. student, Institute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and Textual Criticism,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E-mail: cps@ntu.edu.two